

天涯异草

乌埃尔贝克《幸福荷尔蒙》：

弄潮儿的“幸福丸”

□沈大力

2019年伊始，法国驰名遐迩的作家米歇尔·乌埃尔贝克推出了他的第7部小说《幸福荷尔蒙》(Sérotonine)，迎春潮推波逐浪。

时下，巴黎咖啡馆的热门话题是文坛核心形象“尼斯湖怪”乌埃尔贝克。乌氏屡屡一鸣惊人，被视为一位当代“预见异象者”。早在2001年9月3日，他发表小说《平台》，描述主人公米歇尔的情妇瓦列丽死于一场伊斯兰恐怖炸弹袭击，8天后就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这部小说的情节似乎还预言了翌年10月在巴厘岛夜总会伊斯兰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袭击。2015年1月7日，他又在销售量超过80万册的《屈服》中宣告了几乎同一天出现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摧毁巴黎《查理周报》惨案，因而被舆论界捧为“先知”。他还通过此事扬言，法兰西国土伊斯兰加速，到2022年势必将由一位穆斯林总统主宰，令以拉丁族传统为主体的六角国上下哗然。

新近，围绕乌埃尔贝克的文学创作动态，法新社连续播发6篇要闻，宣传乌氏的新作《幸福荷尔蒙》面世，定将给西方带来“空前绝后的福音”。果然，经一阵紧锣密鼓，元旦刚过，《幸福荷尔蒙》于1月4日上市，弗拉马里翁书局第一版印数就高达32万册，显眼地摆进法国各家书店橱窗，在今冬文学季出版的493部小说中拔得头筹，很快在一些书店出现断货局面。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紧跟，分别在1月7日、9日和10日出炉，同时还将出版卡斯蒂利亚文和加泰罗尼亚文译本。法新社报道，此书的出版构成法国今冬文坛等大事，引起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轰动，同时特别指出：“米歇尔·乌埃尔贝克的第7部小说在黄衫潮涌起前几个月已经写就，预料到了这场运动的兴起，而任何一位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曾有这种先见之明。”

《幸福荷尔蒙》颇具黑色幽默和尖刻冷峻的社会色彩，让乌埃尔贝克的追星族醉心，售书头一天清早就竞相赶赴巴黎王宫广场的“德拉曼”、蒙巴纳斯的“弗纳克”、第六区的“敖德萨”和第十五区的“帝宫”等多家书店门前排长队争购。小说出版者弗拉马里翁书局介绍：“这部记叙作品穿越法国全境，践踏其传统，贬斥其城邦，摧毁其濒临动乱的乡村。作者描绘出一个没有善心和友情、变得无法掌控的世界。”埃洛迪·穆尔兹在巴黎荫蔽大道街上开一家独立书店，仅1月4日上午就售出了30册《幸福荷尔蒙》，一时洛阳纸贵。依他看来，作者乌埃尔贝克确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通过‘露骨文学’调侃，品评人们生活的社会场景”。他强调，《幸福荷尔蒙》是一部“透镜鉴照”，作者的“通灵”本能来自于其本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以及对整个世界现实的洞彻。这是他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缘由。小说揭示了当今消费社会的空虚，现代化追求高生产率，不惜乞灵于“Robot”，任人工智能来役使劳动者本身。它提醒，全球化造成农业社会动荡，出现普遍依靠药物生存诸般现象，令人不安。

法兰西电视台集团下属文化网站《文化邮箱》评论道：“乌埃尔贝克沉湎于从各个角度观察当代社会，洞见各种客体及其功能，在背景上审视自然美的侧影、城邦的丑陋，尤其偏重人类表现。在社会组织方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社会如此这般建筑于劳务报酬的基础上。金钱交易，为权力效劳，构成一切的关键。”法国“新闻电视台”进一步评说：“这本347页的小说锁定于当今的现实。或许，其关键意在言外，尚不可知。”

《幸福荷尔蒙》一书的主人公叫弗洛朗-克洛德·拉布鲁斯特，时年46岁，“身材魁梧、短壮，有点嗜酒”。此人并不完全像作者本人，但也是农艺师，在孟山都跨国公司任职，经历跟乌埃尔贝克相同，负责给法国农业部起草递交欧盟的报告。像乌埃尔贝克一样，此君也要了一位年龄比自己小20来岁的日本女郎“桔子”为妻，住巴黎十三区羊肚菌型未来派混凝土“图腾塔楼”。所不同的是，弗洛朗-克洛德一日从西班牙天体村归来，突然发现本已同他情感疏远的妻子耽于逸乐，不贞洁，对她顿生杀念。在一家酒馆冷静思量后，他觉得不值得为一个毒蜘蛛“黑寡妇”去犯罪坐牢，最终返回在旺代的故乡。浪子回头的阴暗历程中，他靠着心理医生开出的一贴荷尔蒙抗抑郁剂维系，寻思自己还能否在孤独中找到幸福。这也是当今所有法国人试图克服淡漠忧郁症的普遍诉求。

说到Sérotonine这种“幸福荷尔蒙”，作者本人在小说开篇便坦言：“这是一粒可以一分为二的卵形白色小药片。它给生活提供了一个更人、不那么空洞、带有某种刚性的美好释义，但并不能给人以任何形式的福祉。”十分明显，对乌埃尔贝克来说，叫卖“激素幸福丸”，只不过是一种“慰安术”。2017年5月10日逝世的法国作家艾玛纽尔·贝勒海姆是乌埃尔贝克的好友。二人每次碰面，女作家都要问他是否“幸福”，天天服用荷尔蒙“幸福丸”的对方总哑口无言，反倒啼笑皆非，竟常有想自杀的念头。

据《文化邮箱》讯息，乌埃尔贝克口出狂言，不但觉得上帝“拙劣”，蔑称大诗人歌德为“老蠢货”，而且诅咒旺代的传统高卢-罗马古城尼奥尔是他所见“最丑陋的一座城邦”。尼奥市长热洛姆·巴洛日获悉后一腔忿忿，但摆出高姿态，特邀乌埃尔贝克前往会面。市长心知乌氏患有抑郁症，于是向他推荐当地特产的“当归”，夸口说这种“白芷”系“灵丹妙药”，治疗精神忧郁有奇效，特别能够滋养大脑，补虚壮阳，增强人的“幸福感”，不愧为抑郁顽症这头恶魔的克星。“养生堂”的医师清楚，“当归”的疗效出自它富含荷尔蒙’sérotonine’，即今天所谓的“激素”，不竟成了尼奥市长眼中的“幸福丸”，变为乌氏新写小说醒目书名，具有了一种神秘诱惑力。难怪乎巴黎市中心的“帝宫书店”将小说《幸福荷尔蒙》专门放置在医疗丛书类中出售，以凸显其心理治疗功效，迎合市民精神健康的迫切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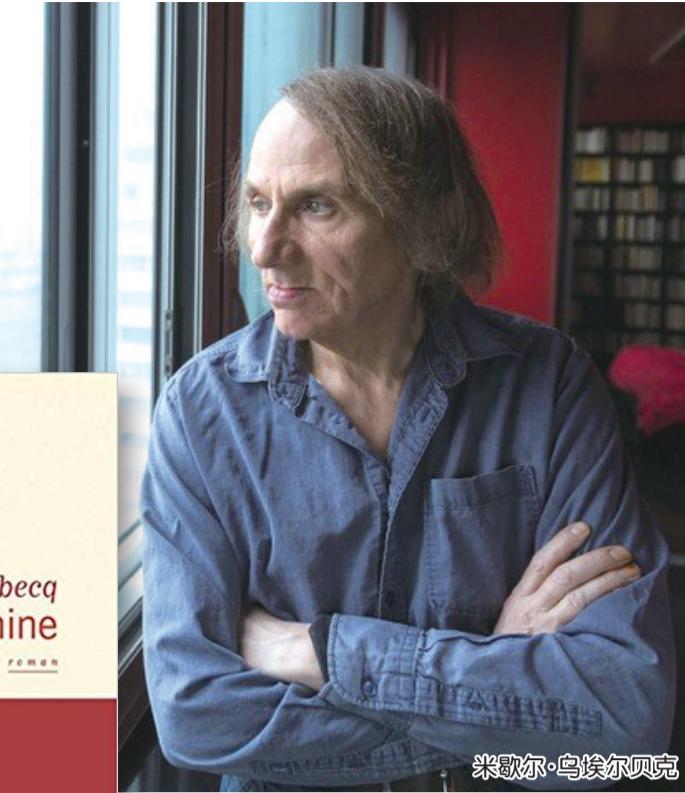
“幸福”几乎已是法国一类西方超消费社会渴望而难以企及的生活目标。《幸福荷尔蒙》作者的“露骨文学观”，触及的正是这一主题，让众多读者在“生态滑水板”上有所体验。小说主人公弗洛朗-克洛德信奉本华或封达纳的哲学，在寻觅无条件持久爱情受挫后，不时沉浸于往昔曾在几位女性身上寄托过的情爱。在日本女郎桔子之前，他闪电般地陆续与凯特·克莱尔和卡米伊有染，真正动情的是20年前在诺曼底跟卡米伊相处。他时而嘴角露笑，时而情感揪心，最后也以失恋告终。西方现代社会解体，因薄情而苦恼，整个氛围如此，难免不渗透进个人精神角落，令人坠入绝望深渊。

弗洛朗-克洛德深切感受到：“对于弱者群体，外部世界是凶恶、冷酷无情的。”的确，整个社会苟活于朝生暮死，全然不顾及世界本质。严峻的现实灾难，远非注射几剂法国人云亦云的“幸福荷尔蒙”可以克服得了的。他得出结论：幸福只是一个旧

梦。今朝在西方，外部环境变化，没人再能够幸福。旧世界老朽衰败了。小说主人公说的这个“外部世界”，包括一些人竭力挽救的“欧盟”。弗洛朗-克洛德作为农艺师，颓唐中在诺曼底幸遇力挽西欧农业危机的德国贵族同行艾默里克。艾默里克在跟20来个旺代农民与共和国保安警察冲突中弹身亡，成为欧盟统一政策制约法国农业的可悲牺牲品。弗洛朗-克洛德赞赏他是承继旺代贵族衣钵，替当代全球化中受难的法国农民请命，乃至为之殉道的“基督骑士”。实际上，这是作者乌埃尔贝克逆潮流、反对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专政”的一种姿态。他公开表示：“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有权利火上浇油！”法国《世界报》女记者尼科尔·沃勒在1月4日《幸福荷尔蒙》面市当天写道：“着实重要的是，作者嬉笑怒骂，从卡尔瓦多斯省‘悬崖镇’的农家乐销售市场，说到布鲁塞尔武断强加的牛奶限额，从抗抑郁激素的药效到亲戚自杀，从巴黎第十三区塔楼到重组家庭，一篇篇娓娓而谈，意趣横生，亦不乏自嘲。其白描手法独特，任凭读者自解其中滋味。”

法国《解放报》载文指出：“作者换位思考，描写农耕者危在旦夕，陷入绝望。他近来赞扬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猛烈攻击欧盟的自由主义政策，视之为万恶之源。虽被指玩世不恭，但却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确实，他赞扬英国“脱欧”有勇气，为欧洲人树立了榜样，而法国人的雄心在于跟美国和中国对话。英国《电讯报》强调：“乌埃尔贝克预言了西方文明悲剧性的厄运”。右翼的意大利《时报》则将乌氏比喻为乔治·贝尔纳多斯，说他的《幸福荷尔蒙》“打开了了解世界走向的新篇章”。

乌埃尔贝克2010年以小说《地图与疆域》获龚古尔文学奖，刚刚又从法国当局领到“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被媒体追捧为“21世纪的巴尔扎克”。他十分懂得商业营销术，深谙结交社会显贵，通过媒体传播兜售自己之道。具体通过专门的经纪人弗朗索瓦·萨缪尔松为他张罗公关，采取“金钱与性”的渠道在社会结网。他深知“名利场”有不测风云，在2010年靠小说《地图与疆域》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当晚对萨缪尔松说：“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但到明天，一切就行将结束”。他每部小说发行量都高达数十万册，且迅速翻译成各国语言，流行全球各地。然而，此君又是最具争议的当代法国作家，每回作品发表都众说纷纭，掀起偌大风波，眼下的这本《幸福荷尔蒙》也不例外，六角国里激烈攻击者大有人在。有的巴黎普通市民对媒体围绕《幸福荷尔蒙》的鼓噪感到厌烦，不能认同广播电视



米歇尔·乌埃尔贝克



《幸福荷尔蒙》法文版封面

“如此喋喋不休地吹嘘一个‘无耻之辈’”，声言：“我决不会读他的这本书！”

笔者看作家菲利普·拉布罗主持的电视时事辩论，听到法国荧屏名嘴尼古拉·道迈纳克的独特见解。据他看来，乌埃尔贝克新出版的小说《幸福荷尔蒙》纯粹是一本“平庸之作”。《费加罗报》连篇累牍地吹嘘它，甚至将作者捧为“今世巴尔扎克”，更是十分荒唐。

乌埃尔贝克则推说传媒对他“过誉”，向报界声言：“我会死去，毫不虑及自己的小说要引起什么反响。不抱幻想，就心安神定。”一念及此，他公开宣布与报界断绝关系，今后不再接受任何传媒采访。报界这般册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且，乌氏不善言辞，声称自己处在一种悬浮时空、一种泛银河系的星际之中，不愿多动脑筋，不涉世事，甚至离开法国，到爱尔兰的彼瑞孤岛上居住。实际上，他倒是认为“人生如戏”，像巴尔扎克那样在写“人间戏剧”，只是比巴尔扎克逊色，人物刻画上难以“入木三分”，成了需要偶像的当今法国文坛上一个摇滚“活神话”。

这个新偶像藐视诗哲先驱，口出狂言：“在文学上，本人不屑借鉴前辈，不论塞万提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均不在话下。我们这一代人阅读面广，自有独特风格，还真谈不上受了他们什么影响。”

电视资深文学节目评论员贝尔纳·毕沃十分重视小说《幸福荷尔蒙》的哲学内涵。在他眼里，一部文学作品敢以科学词汇命题，乍看起来似乎有些怪异。或许，作者扮成一名“小化学家”发话，故弄玄虚，用身体不可或缺的生长激素当作“幸福丸”，是想给渴望慰藉的人们带来一颗“福星”，亦未可知，权对之如此释义。用一家巴黎媒体评论来说：灵猪拱块蔬，此乃一幸事。至少，《幸福荷尔蒙》从城岛一家夜总会开始，到诺曼底“朱安党”人起事遭保安警察镇压，反映出法国这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面临的精神沉沦等多种矛盾。作为超消费社会的“基本粒子”，乌埃尔贝克的“俗众文学”表面上并无振臂一呼的姿态，最后在小说尾声里还表示了针对众生之不争的嗟叹：“归根结蒂，难道我还得把自己的生命给这些可怜虫？难道真的应这股明示态度？只能如此。”此番话跟乔伊斯《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的独白如出一辙。

译介之旅

翻译之为家园

□尼古拉·马兹洛夫 李海鹏 译

尼古拉·马兹洛夫，诗人，散文家，译者，1973年生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出身于一个巴尔干战争的难民家庭。18岁时，南斯拉夫解体，文化身份发生了转变。马兹洛夫的诗歌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出版，《重置的石头》曾赢得Hubert Burda欧洲诗歌奖，米拉迪诺夫兄弟诗歌奖，还获得数个文学奖金，包括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柏林DAAD文学奖金、法国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文学奖金等等。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语言是一副身体，他在其中感受到所有的愉悦与限制，所有的痛苦与暂时的消失。去思考，便是将渴望翻译成真实；去记忆，便是将时间从保守的翻译成个人的；去做梦，便是将我们不曾见过之物翻译成永不得见之物；去做一个流亡者，便是将来自家园翻译成永远的流离失所。

切斯拉瓦·米沃什将语言视作一个真正的家园。而我愿意将家园视作一种语言。如今，家园的改变、对丢失存在之基的恐惧，双重催生了渴求保护语言的急切。有时，词语迷失在新的语言区域里，仿佛充满惊奇的孩童迷失在市郊。不计其数的充斥着历史与意识形态背景的诗歌都在翻译中迷失了，它们被揭下了表面的史诗品质。因此，翻译不是占据新的空间，而是揭开它们。然而，它不是与诸如“谷歌”翻译之内涵相亲近的将一种语言记忆成另一种的翻译方式，而毋宁说是揭开经验语言与在场的新空间，一种情感真实的新的考古学。

在从一个家园搬到另一个的过程中，我们将自己从一种不确定搬到另一种，从一个信任搬到另一个。我所书写的语言仅仅被200万人所使用，他们每天迁移着，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家园，在家具前，将他们的记忆存放在崭新的空间。曼德尔施塔姆写道，被驱逐出语言等同于被驱逐出历史。在对消失的惊慌失措中，巴尔干地区的许多国家都转向了那提供给它们宽敞而易碎之现实的历史。诗歌被建造在维希留的消亡美学之上，并被已经说出但尚未写下的事物之根所喂养。在巴尔干地区，我们在

战争中相聚，在诗歌中分离。幽闭恐惧症已经成为生存的主导哲学——公寓有着小小的阳台和低矮的天花板，为了更好地保存一个人的不安。进入每一间卧室，都沉睡着记忆的零散碎片。我的祖先们曾是战争的流亡者，在徒步跨越边境和山区时，他们并不写诗，当他们逃出家园，并基于物理学来决定什么样的重量能够携带时，他们也并未选择去携带书籍。另一方面，有如此之多的书籍是为流离者而写，我相信它们不能从全世界的废弃房屋中被收集起来。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将自己视为一个不可见的目击者，视为一个购买和偷窃旧书的人，而不是从家庭相册里购买和偷窃历史或照片的人。

诗歌的神秘化者会说，诗人需要一个笼子以便书写空间，需要空间以便书写笼子。在两种情形下，诗人都看到了两座律师席之间的空气。当代的作者们不需要看到任何边界，即使当海关官员满腹狐疑地将他的面孔与护照上的照片相比对之时。语言即是他的城市和家园，当他的祖国是对平静死亡的唯一幻想时。我有一种感觉，诗歌从未开始，更奢谈继续，如同战争一样。每一首诗都被岁月擦亮，仿佛遗忘之侧的书架上摆放的石头。我觉得，一首诗的每一个新译本都是打破的碎片，如同空荡荡的走廊里摔碎的镜子，随后再创造出某种不同的完整。在英语中，动词“巴尔干化”——意味着分裂、拆散——如今被广泛使用……这一残忍的边缘社会学式的翻译已成为每一个来自巴尔干地区的人身份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翻译的记忆，被翻译的生命，被翻译的忘却，被翻译的谅解……我常常好奇于一个巴尔干作家需要在自己身上整合多少种身份，才能在与全世界视之为一个分裂者这一刻板印象的对抗上获得一场胜利？我不得不翻译我自己，从一种偏见进入另一种，从一座家园进入另一间客房。

当我离开我的童年，携带着一头受伤的动物，我曾居住的国家南斯拉夫沦为一座战争的家园。突然，学校里阅读和翻译列表上的作家们被宣布为国家与经典的双重敌人，那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不会有再去阅读和翻译他们了。然而远离家园的恐惧，在我个人的翻译列表上将永恒存在下去。

言 论

中国的文人，特别是作家和学者，大多秉承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没有注意到，正是那些大牌名酒早已摆脱羞羞答答的难为情态，走出深巷大宅，多少年来在持续做宣传，打广告。那些商家深信的话正好相反：“酒香也怕巷子深”。

莫言的作品如果还在“深闺”，没有《红高粱》电影的强力推介，没有十几种外译本，没有媒体的深层报道，莫言的“酒”再香也还是储藏在高密乡的破烂地窖里，最多是十里八乡的人花上几块钱沽几坛去，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的时候小酌一下。像莫言这样的“酒”，上海、北京、陕西、四川等地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在少数，但多数还都藏在深巷中。

十几年前《三体》连载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部作品会在世界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更想不到其英译本受到那么多西方读者青睐，还获得雨果奖、银河奖、克拉克奖等多种大奖。译作本身的质量无疑是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因素显然不容忽视，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随着文化商品化的不断加深，市场因素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也越来越大。要想使中国文学更快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恰当的宣传和正确的推介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和环节。

麦家的《解密》(Decode, 2014)能在海外迅速走红，与出版公司以及相关媒体等各方面对原作者及译作的大力宣传密不可分。在《解密》英译本出版前后，出版社及作家对其做了足量的宣传，其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UK)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 and Giroux)联合出版，在英、美等35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出版不久就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美国亚马逊的世界文学榜单上曾位列第十，被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评选为年度优秀图书之一，成为迄今惟一一部入选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麦家成为第一个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当代作家。可见，走出娇羞态，不再难为情，是中国文学的当务之急，也是文学走出去的堂奥之一。

至于说到作品外译，认知上则更是乱了套。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像莫言的英译者葛浩文那样“随意增、改、删”，自己的作品才能走出去。汉学家们的翻译有些地方是作了调整，但那是根据目标读者的接受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做出的。有些时候我们光是简单地从字词语句方面做了简单的对比，没有从语意、语境、意境、典故、氛围、节奏、语气和韵律等多方面去考量，没有从深层语境下或从更高层次上去考量汉学家们的翻译。作为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并没有“随意”增、改、删，为数不多的“增、改、删”也进行得非常审慎，都征求了莫言的同意，有的增、改、删还是出版社的意见。葛浩文曾多次强调，一个译者不能做一个文化殖民者，坚决反对个别英美翻译家所采取的完全归化(英语化)的翻译方法，他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把莫言作品忠实地翻译到英语世界中去的。葛浩文的译文越是忠实原文，我们就越能看出莫言作品自身具有的魅力所在，同时也说明像杨宪益等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所采取的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义，说明这个时间中国文学文化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出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国际条件。

朱振武

酒香也怕巷子深